

我心中永远的大先生

■郭传杰

8月17日晚,伴着淅淅沥沥的秋雨,“光召走了”这一噩耗在熟悉周光召先生的人群中迅速传播。非常静悄,就像怕惊扰了先生的安睡;又如惊雷,轰响在许许多多人的心头。

周光召先生是中国理论物理学家,但他的学术影响超越了国界;他是中国科学院原院长,但他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超越了院界;他是位自然科学家,但他的理念、精神和人格力量超越了科学技术范畴!

伴随光召先生逝世消息的不胫而走,先生的音容笑貌、丰功伟绩、崇高风范,一幕幕、一件件闪现在我们的眼前和脑海中……

—

光召先生是位极富创新精神的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也是一位功勋卓著、务实低调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光召先生生于1929年,湖南长沙人。1951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52年在北京大学师从彭桓武先生攻读理论物理研究生。1957年,被国家选派赴位于苏联杜布纳的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基础研究。不到4年里,年轻而才智超人的他在国际著名期刊发表重要论文33篇,两度获得科研奖金。其间,他于1959年严格证明了电荷共轭宇称(CP)对称性破坏的一个重要定理;1960年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的相对螺旋态振幅,并自建数学方法,简明推导出损失量流部分守恒定理(PCAC),年轻的周光召被誉为量子物理PCAC理论奠基人之一,享誉国际理论物理学界。

在学术研究方面,李政道先生曾评价光召先生说:“在我们这些人中,他也是佼佼者。”杨振宁先生说:“光召先生是一位顶尖物理学家。他视野宽阔,影响力深远,并且能够快速地洞悉新思想。他做物理研究的风格让我想起了Landau(朗道)、Salam(A.萨拉萨尔)和Teller(泰勒)。”其中,前两位是诺贝尔奖得主,后一位是“氢弹之父”。

1961年,正当光召先生在理论物理前沿披荆斩棘,高歌猛进时,国内传来因苏联撤走专家,原子弹研制受困的消息。他当即决定,放弃已有建树且深感兴趣的粒子物理前沿研究,启程回国。光召先生隐身于茫茫戈壁滩的简陋实验室近20年,把一生最富有创造力的岁月,奉献给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作出了卓越的历史性贡献。

周光召曾说:“一个民族要在精神上站立起来,必须要有自信,必须要有伟大的科学家和重大的发明来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和自信心。”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刚到杜布纳不久,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对“大权威”的报告提出异议,遭到无礼的排拒和轻蔑。28岁的他既不屈服,也没硬顶,而是花费近百天的时间精密分析和演算,终于使该大人物坦承报告有误,并结为朋友。1961年,在确定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的过程中,刚刚回国的他,以物理学家的理性思维,另辟蹊径,巧用最大功原理,力证苏联专家数据的不可能和我国专家9次计算结果的正确性,从而结束近一年的学术之争,扫清了原子弹理论设计中的一大障碍,再次以卓越的人才华展现了民族尊严和自信。

二

光召同志是一位极富远见和理性思维的战略科学家,也是一位帅才难得、德高望重的高层科技领导人。

他于1984、1987年先后受命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至1997年。其后,他连任第五、六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10年。中国科技界的人,回望过去那些峥嵘岁月,无不感怀幸有光召同志托庇。2014年春节前,国务院分管科技工作的领导来到北京医院,站在光召同志的病床前,眼噙热泪,动情地说:“光召同志,您早点好起来吧,中国科技界需要您啊!”这句话道出了科技界许多人的共同心声。

上世纪80年代初,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界改革探索最为艰辛、风云激荡的岁月。改革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是科技改革的动力、目标、规律、战略、政策、路径是什么,考验着每位决策者的格局、远见、胆识、智慧,甚至还有良知。

当时,社会中对科学缺乏长远认识者大有人在,鼓吹“科学无用论”者有之;认为基础研究“不冒泡”,对中国科学院的存在价值质疑者有之;否定技术成果商品转化,说中关村“骗子一条街”者有之;否定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特点,以简单方式“断粮”、削减经费者有之……十多万之众的中国科学院,不少科研人员连基本工资都无着落。中国科学院犹如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艘旗舰,颠簸震荡,进路不明。周光召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临危受命成为中国科学院领导人的。

光召同志走上副院长岗位后,半年中深入基层做大量调查研究,同时以理论物理学家的头脑洞悉科学技术发展的内生规律和时代特征,以深厚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感把握国情和院情,很快形成了自己的科技战略思想体系。在中共中央于1985年3月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前的两个月,即1985年1月,光召同志在中国科学院年度工作会议上,受卢嘉锡院长委托,作大会总结发言。他未用一字讲稿,侃侃而谈,做了一个既充满理性思考、洋溢思想光辉,又有政策举措、务实可行的重要讲话。回望过去近40年的科技体制改革实践,大凡成功之处,在这个讲话中都可以找到早期的思想源头。反之,实践中一些出了偏差、走了弯路的,讲话中也有过警示或提醒。

在这篇讲话及其后的长期领导实践中,光召同志总是基于世情、国情、院情的深刻透彻分析,以严谨的逻辑思维阐发科技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面对内部怨天尤人的不理解情绪及外部“解散中国科学院”的各种杂音,他指出,科技体制改革是经济社会强烈需求和科学技术内在发展双重作用下的结果,它不以个人的好恶为转移,也不是某个领导人的决定。以现成的模式和状态,中国科学院是否能继续存在的确定是值得怀疑的。心态要以主动、积极的姿态,而不是被动、防守的心态进行改革。中国科学院不仅是我们这些编制在院的人的中

国科学院,更是人民的中国科学院、面向全国的开放的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的存在定理需要我们长期不断地去证明。我们要有信心,创造一个适应时代、适合中国的新科技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著名的新时期办院方针,较快统一了全院的思想认识,校准了前行航向。

面对社会上“科学无用论”“科技同一论”等各种看法,他首先提出科学技术发展的“双动力”论,并据此强调科学与技术、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具有各自不同的地位、作用和规律,要按不同的价值准则和运行机制确定不同的政策措施。

对科学的发展,他强调长远性、原创性和开放性,“基础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队伍要精干,要把最有创造力的年轻人推到科学研究前沿,给予稳定支持。若只顾眼前利益,“不保留精干的科学研究力量,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他创造性地提出并在中国科学院遥遥建立了全国第一批开放实验室、交叉科学中心,要求以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机制运行,并指出“开放实验室是未来科研组织的雏形,是‘国家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的多年实践,完全证实了他当年的预判。面对国家急迫重大的经济建设“主战场”,光召同志调动科研主力,在全国与企业、地方组成紧密合作的研发中心或基地,以项目为纽带,攻坚克难。如上世纪80年代末,面对国家经济所急,利用全院在资源、环境、农业领域的科研优势,组织了黄淮海“战役”、黄金攻坚战等,为解决国家粮食、财政等急迫问题作出重要贡献。

对技术开发类工作,他强调要按市场经济规律,积极推动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工作,发展高技术企业、联想、三环、中科集团、中星微电子、科大讯飞等一批有影响的高新企业,早期的发展都得到过他的关心和指导。与此同时,他一再告诫:“办公主要盈利,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而忘了我们创办公司的根本目的是要探索一条把科研和生产相结合的路径,要为发展我国的科学和经济服务,那就不好了。”

在此基础上,鉴于两类科技工作具有不同的性质、规律、运作机制、评价规则等,他在当时的历史境况下,创造性提出“一院两种运行机制”的治院模式,为不同类型的科技工作按自身价值取向和运行规律,铺设了既有差别,又有联系的不同发展航道路,既保持了青年人才,既保存、壮大了基础研究力量,又开创、发展了我国的高技术产业。

在确立中国科学院发展方向、道路的同时,人才问题始终是他脑中的战略大事。在这次即席讲话及其后整个决策管理实践中,培养、吸引、关心、爱护、使用、评价、引领等方面的决策全面体现了他的入才思想。首先,他从长远的战略视野,关注优秀年轻科技队伍的建设。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化大革命”10年造成的人才断层问题十分严峻,他在1985年1月的那次讲话中就紧迫地呼吁:“要创造更好条件,把优秀年轻人就吸引到研究领域中来。”

1990年,他提出“必须在10年内,顺利完成科研重担的代际转移,这是关系中国科学院未来的重大战略问题”。同年,他提议并主持召开全院青年科技人才工作会议,这是中国科学院,也是全国范围内召开的首次青年科技人才大会。

1994年,在反对“全盘西化”的社会氛围下,他倡导实施了全国第一个以吸引、遴选高层次人才带头人目标的专项计划。他说:“育人做伯乐,莫如做朋友。”总是以平等的态度和青年交朋友,对优秀青年人才关爱有加,不仅在工作上放心放手,“给位子、压担子”,而且亲自谈心、交朋友。他倡办成立的中关村“青年创新联谊会”,培养了大批科研、企业和管理领域的领军人才。在那些岁月,有事“找光召谈话”成了院内外优秀科技人才的口头禅,光召先生也乐于把有限的时间尽量多地分给他们。

对年轻同志,光召先生绝不是只有呵护和关爱,没有教育和要求。他曾讲:“年轻人要眼明心亮,靠年龄优势是接不好班的,必须在品德和能力两方面都达到很高水准。”在一次考察干部的出差途中,他对我说:“现在的年轻人中,聪明能干的人很多,但要做到品质可靠、为人正直、作风踏实的人,还得多方面、大范围仔细考察。”

2004年春节前,我建议他见见中国科大一位科研做得很不错的年轻科学家,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他人品怎么样?”直到我讲了该年轻同志的两个真实故事,他才说:“好吧,你带他来。”后来,这位青年科学家在他的关注和支持下,在量子科学前沿作出了卓越创新贡献。

光召同志在紧抓青年创新人才这个战略关键的同时,善于从大系统角度,充分调动各类各级人员积极性,反复提醒“每种工作,只要是整体需要的,都要受到尊重,要有正确的评价”。“在中国科学院,要让各类人员都各得其所,充分调动各类人员

积极性的方针是不能变的!”正是基于这种人才理念,他在掌舵中国科学院期间,尽管条件极其困窘、资源十分有限,但对科研、开发、管理、后勤各不同岗位,对老中青不同年龄段的人,他总是以相同的温厚情感,不同的评价尺度,制定相应的支持政策,努力调动、激发各类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

光召同志离开中国科学院领导岗位后,以中国科协主席、“973”计划总顾问等身份,时刻关心着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在我国科技改革和发展事业的不同阶段,他总是以极大的责任感,敏锐地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前瞻、辩证地及时指出问题,提出应对之策,引导和指导科技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

在2005年的中国科协年会上,光召同志指出,我国科学技术大发展的外部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大发展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是,一定要处理好学科与任务、基础与应用、重点与面上、个人与团队、创新与科普、老中青、产学研等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是相互依存又互为矛盾的统一体,我国历史上,对这些关系的把握有过多次失当,反复折腾,危害很大,定要引以为训。

三

光召同志的一生,既是坚守科学精神的典范,也是弘扬科学精神的旗手。

由于历史原因,科学精神在中国近现代以来一直是稀世珍品。无论是做科学,还是当领导,光召同志总是自觉地把坚持和弘扬科学精神,视为自己的义务和职责。他曾经说:“我认为,科学精神最重要的是求真、务实。”他把求真视为科学精神的第一要义。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他面对权威能自信地坚持真理,在当领导作决策的过程中,从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真和实。上世纪80年代后期,面对社会上一时泛起的怀疑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他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直言己见:“我认为,中国科学院的广大科技人员是值得信赖的!”面对社会上非议开放、怀疑留学政策的说法,他及时指出,在当领导作决策的过程中,从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真和实”。上世纪80年代后期,面对社会上一时泛起的怀疑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他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直言己见:“我认为,中国科学院的广大科技人员是值得信赖的!”面对社会上非议开放、怀疑留学政策的说法,他及时指出,在当领导作决策的过程中,从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真和实”。上世纪80年代后期,面对社会上

一时泛起的怀疑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他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直言己见:“我认为,中国科学院的广大科技人员是值得信赖的!”面对社会上非议开放、怀疑留学政策的说法,他及时指出,在当领导作决策的过程中,从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真和实”。上世纪80年代后期,面对社会上

一时泛起的怀疑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他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直言己见:“我认为,中国科学院的广大科技人员是值得信赖的!”面对社会上非议开放、怀疑留学政策的说法,他及时指出,在当领导作决策的过程中,从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真和实”。上世纪80年代后期,面对社会上

一时泛起的怀疑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他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直言己见:“我认为,中国科学院的广大科技人员是值得信赖的!”面对社会上非议开放、怀疑留学政策的说法,他及时指出,在当领导作决策的过程中,从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真和实”。上世纪80年代后期,面对社会上

一时泛起的怀疑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他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直言己见:“我认为,中国科学院的广大科技人员是值得信赖的!”面对社会上非议开放、怀疑留学政策的说法,他及时指出,在当领导作决策的过程中,从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真和实”。上世纪80年代后期,面对社会上

一时泛起的怀疑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他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直言己见:“我认为,中国科学院的广大科技人员是值得信赖的!”面对社会上非议开放、怀疑留学政策的说法,他及时指出,在当领导作决策的过程中,从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真和实”。上世纪80年代后期,面对社会上

一时泛起的怀疑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他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直言己见:“我认为,中国科学院的广大科技人员是值得信赖的!”面对社会上非议开放、怀疑留学政策的说法,他及时指出,在当领导作决策的过程中,从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真和实”。上世纪80年代后期,面对社会上

一时泛起的怀疑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他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直言己见:“我认为,中国科学院的广大科技人员是值得信赖的!”面对社会上非议开放、怀疑留学政策的说法,他及时指出,在当领导作决策的过程中,从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真和实”。上世纪80年代后期,面对社会上

一时泛起的怀疑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他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直言己见:“我认为,中国科学院的广大科技人员是值得信赖的!”面对社会上非议开放、怀疑留学政策的说法,他及时指出,在当领导作决策的过程中,从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真和实”。上世纪80年代后期,面对社会上

一时泛起的怀疑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他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直言己见:“我认为,中国科学院的广大科技人员是值得信赖的!”面对社会上非议开放、怀疑留学政策的说法,他及时指出,在当领导作决策的过程中,从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真和实”。上世纪80年代后期,面对社会上

一时泛起的怀疑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他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直言己见:“我认为,中国科学院的广大科技人员是值得信赖的!”面对社会上非议开放、怀疑留学政策的说法,他及时指出,在当领导作决策的过程中,从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真和实”。上世纪80年代后期,面对社会上

在科学管理领域,他有很多独具慧眼的新见解。1992年7月,我主持举办了第一次香山科学会议。会后,当我向他汇报会议的开会以及十分活跃的学术氛围时,他高兴地给予了肯定,同时又指出,也不能老搞“无主题”讨论,学科交叉要善于抓住焦点科学问题,研讨才能深入。那些年,他多次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参加香山科学会议,在香山科学会议持久健康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

在一次香山科学会议上,他在分析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的过程后指出:“在艰苦的环境中,未必不能产生重大的科学发现。20世纪有些重大科学成果,都不是在物质条件最好的实验室产生的……关键是要有创新的人才和创新的文化环境。”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快速转型,在金钱至上的拜物思潮下,学术界开始出现科研不端行为。光召同志积极鼓励支持学部成立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严肃处理涉及科研道德的人和事,对学术造假、剽窃等行为深恶痛绝。与此同时,他对社会上出现的帮派迷信活动及“水变油”之类的伪科学,深刻剖析,严加鞭挞。

光召同志旗帜鲜明地及时支持《中国科学报》开展维护科学尊严的专题大讨论,并在1996年2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科普大会上,以“加强科学普及,弘扬科学精神”为题,据实发难地指出:“我们这个社会,科学精神不足是有历史原因的……近代以来,凡是在社会变革转型较激烈的时期,一些不了解科学和社会发展趋势的人,往往产生神秘感和不安全感,不能掌握自身命运,于是感于今生,期于来世,就到迷信活动中寻求心理安慰……当前进行的经济体制转轨是场很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上各种思潮必然有所反映。我们这些搞科学的,就要举起科学的旗帜,矫正邪邪。科学有不起的精神力量!科普宣传传播知识不够,更要重视传播科学的思想、方法,弘扬科学精神!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他这一深刻犀利、跨越时空的讲话,在会场内外引起热烈反响,对科学精神的呼唤,在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上,再次成为时代的强音。

据有关学者近年考证,周光召是把“科学精神”引入我国科普话语体系的第一人。有感于我国科学精神的匮乏,他特别强调要在各级领导决策中落实科学精神,不能只拍脑袋,唯上是从。

四

光召同志一生,怀赤子之心,担当之勇,以温厚待人、律己修身,他的家国情怀和人格力量,体现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底蕴。

光召同志对国家、对人民的爱,是大爱、真爱,不在口头,而在行动;不高调,而是深沉。上世纪60年代初,而立之年的他毅然舍弃学术发展的光前景,从容回国,为“两弹”研制作出杰出贡献。面对功勋奖章,他说“我是个很普通的人……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

改革开放初期,他再次放弃期盼已久的学术研究,临危受命主持困境中的中国科学院,运筹帷幄,使这支宝贵的科技国家队重焕生机。

他是国家最高学术殿堂的带头人,但一贯心系基层劳苦大众。1988年,他在会见来中国科学院寻求支持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时说:“中国科学院是全国科学家的中国科学院,也是全国人民的中国科学院。你们的困难也是我们的困难,中国科学院的人虽然主要是做科学的,但我们的心,同全国人民还爱国的人民永远是连在一起的。”

从那时起,他在全中国首倡了选派“科技副职”的制度,几十年来无数科技人员为许多地方的脱贫、发展,作了巨大贡献。2011年11月15日召开的一次会议,是他科学人生最后一次参加的会议。在分析我国能源、环境、生态等紧迫问题,并指出“973”计划必须“带着危机感创新基础研究的布局”时,他昏倒在讲话现场,心平气静地远离了他爱和爱他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光召先生一生,经历过国家苦难、站立、振兴的不问岁月,造就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与担当。

光召同志本人是位有担当、有风骨、有气质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位最懂得、最爱护科技人才的领导人。他从自身的经历中,得到了一个真切的理念:人是最可宝贵的,但人也是最易被伤害的。

他爱才、重才、惜才的实例不胜枚举,他在领导工作中对科技人员的信任、理解、鼓励,随处可见。上世纪80年代初期,许多科技人员对科技体制改革还不太理解,他一方面坚决反对“断粮”“逼人下海”等硬性伤人政策,同时苦口婆心地对科技人员侃侃而谈时代特点、科技规律,启发科技人员自觉转变观念,从不以势压人,强加于人。杨振宁形容周光召是“一个完美的儒家思想践行者”,不像西方许多大科学家那样咄咄逼人。许多在他身边工作过、熟悉光召

作,“这种精神和对科研的执着,深深影响着”。

推动原始创新 反对“数统文”

2011年11月15日,周光召突然病倒。那是在北京会议中心,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主持的“973”计划专家顾问组会议上。周光召刚做完关于“973”计划任务的总结讲话,就突发脑出血,倒在徐冠华的身旁,从此再没能康复。每每想起这一幕,徐冠华的内心总是百感交集,心绪久久无法平静。

“973”计划为我国基础研究工作的一面旗帜,倾注了先生大量的心血。”今年5月,在周光召九十五华诞之时,徐冠华在《中国科学院院刊》撰文谈到,周光召提出了一系列前瞻性的构想,对“973”计划的战略定位、科学评价、创新链上下游的有机结合、人才培养、资源配置、学风建设等方面都有深刻、系统的思考,形成了一套有

的同志都有这种感受:接受他的思想、观点或工作任务,与其说是出自下级对上级的职责服从,倒不如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与自觉,这既是一种理性真理的征服,也是一种人格力量的折服。

光召同志是一位光明磊落,表里如一。凡自己主张的,他一定首先做到,自觉践行,绝不像某些台上马列、台下小人的伪君子。他待人宽厚,但自律极严。“有诺己而后求诸人,无诺己而后非诸人。”

中国科学院应是科学文化最浓厚之地,他处处以身作则,维护这方“净土”,使之尽可能少受污染。对科技界曾泛起的“官”越大,资源越富,学位越高,论文越多的乱象,他大声疾呼“当官与做科研不能兼得”。而他自己早就是这么做的,1984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他就主动不招一个研究生,不申请一个研究项目。1977年他未担任领导之时,由他牵头

的“闭路格林函数研究”项目,早已获得国际好评的成果,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几次推荐评奖,都被他以“我当领导,叫人家怎么评”为由挡了下来,直到他却任院长3年,项目结束整整15年之后,才同意申报,最终获评2000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上世纪90年代初,他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积极推动领导中国工程院的筹备工作,但在酝酿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30人名单时,他却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1993年,光召当年在社布论的同事给理论物理研究所寄来他在苏联工作期间发表的全部论文目录,并提议理论物理所组织学术活动为他庆祝65岁生日,对此光召坚决反对。2008年末,理论物理所准备按惯例,在他80岁生日时开一个小型学术会,为他庆祝生日。我和另一位同志受托跟他商请该事时,还没听完,他就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不搞不搞!”直到一再说明这是许多同志的心愿,而且是惯例、纯粹学术性的,他才勉强接受,但条件是“绝不能超过光召先生那次小会议的规模”。

光召先生是一个完全无我的人。工作中,他以真情帮助过许多科技人员,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批”过他的普通工人,解决过各种大大小小的困难。但是,当一个亲戚因为具体困难,求他帮助从外地调到北京时,他却坚决拒绝,并晓之以理:“非办不了,而是不能办,不能开这个口子。”上世纪90年代,作为院长,他出差乘飞机从不坐头等舱,住宿就在研究所的简易招待所。当地政府知道后,总以遵照安保规则的要求接他去国宾馆住,他则多次以“住在研究所哪会不安全?跟科研人员在一起,交谈方便些”为由予以谢绝。“一生常耻为身谋”是陆游的名句,也正是光召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

光召先生性情内敛,言语不多,不喜应酬。不了解的人觉得他严肃有余,架子很大。实际上,他性情温厚,是位极其平易近人,亦师亦友的长者。在中国科学院,甚至全国科技界,凡是认识他、了解他的人,无论是同事、下级,还是小字辈的秘书、警卫、司机,对他多是直呼“光召”,少有加个“院长”“官衔”的。他曾经说过:我就喜欢这样叫我。有人称呼我“院长”“主席”“委员长”什么的,我真觉得不自在。据许多青年科学家回忆,当第一次见面见光召时,总难免有些拘谨,他总是微笑着说:“不必客气,叫我光召。”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在无拘无束的倾心交谈中,说到会心处,平时不苟言笑的他,偶尔也会发出爽朗的笑声。光召喜欢自然淳朴,那些形式主义的规矩俗套常常让他感到痛苦不堪。有些小型会议开始时,也要搞些仪式感来,领导致辞之类的套话,他有时实在受不了,就直接打断说:直接开始吧。光召先生的日常生活非常简朴、纯粹。关注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是他一辈子坚持的主要爱好,无论哪个学科领域出现了重大突破或有新的发现,都会令他感到由衷的喜悦。

现在,带着一身的功勋与成就,带着无数学人的崇敬与思念,光召先生平静地走完了他95年的人生之旅。

光召先生的一生,科学成就傲世、领导业绩闻达、为人堪称典范,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任何人在,在这三者之中做到了一件,也算了不起的人生。

光召先生走了,他再也不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和科学事业呕心沥血了。但他的诸多开创性贡献和赤子情怀、君子风范,将永远铭刻于现代化的大业、科技史的册和善良人的心中。

光召先生的科学人生,如同一本厚重的大书。常常阅读它,将为我们启迪思考,开启智慧。随着时光的流逝,书中主人公的背影将越来越清晰、高大。

1935年11月23日,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两句著名的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光召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光召同志精神不朽!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

“巨星”陨落! 他是中国科技界当之无愧的一面旗帜

(上接第1版)

当时,第一颗原子弹的总体计算陷入困境,科研人员为一个关键数据反复计算了9次。由于是苏联专家提供的数据,很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是正确的。周光召巧妙利用最大功原理论证了苏联专家数据均不可能,终结了争论,推动总体计算继续顺利进行。这是他为原子弹研制立下的首功,为推动核武器研制中的自主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注科学发展前沿,是周光召一辈子的坚持。后来,他因病住院,在此期间,科学突破成了最能打动和慰藉他的事之一。

有两件事给吴岳良留下了深刻印象。2016年初,美国科学家宣布首次直接探测到引力波的存在,这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实验验证中缺失的最后的一块拼图,这一科学突破震惊世界。国内电视媒体采访了吴岳良。

周光召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一消息和吴岳良接受采访的画面,因病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他,激

动地用肢体语言颤颤巍巍地“诉说”他的愿望。站在一旁的吴岳良看懂后,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即致电吴岳良并邀请他来宣讲引力波。

“我讲了大约半个小时,周先生非常激动,眼睛看着我,一只手掌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吴岳良回忆道。

第二次是在2018年,吴岳良完成了“超统一场论”研究工作。这一工作源于1996年,回国后的吴岳良与周光召开始共同研究大统一理论,次年,他们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题为《对所有基本力的一种可能的大统一模型》的研究论文。这是“超统一场论”最初的想法。而那一年,周光召又一次因国家需要,担任中国科协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放弃他喜欢的理论物理研究。

2018年,论文发表后不久,吴岳良向老师汇报这一成果。这一次,他慢慢地讲了一个多小时。

吴岳良说,周光召始终坚持科学研究具有世界第一,没有世界第二,必须要做世界第一的工

中国特色的基础研究发展思想体系。

周光召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和推动由来已久。徐冠华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资源匮乏,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始性创新不足。解决这些重大问题,没有模式可以借鉴,也没有外部力量可以依靠。

周光召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采用新的发展思路。他强调要充分调动科学家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强原始创新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另外,他又提出“双驱动”的战略思想,即基础研究既要依赖科学家在探索自然现象和规律方面的好奇心,又要依靠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如今,中国对高质量自然科学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在高质量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份额已经排名第一。但徐冠华在文章中提到,周光召针对我国科技界出现的盲目追求论文数量等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要避免评价体系的急功近利,要提倡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引导科学家从事更具有长远影响和重大科学意义的工作。”

周光召强调,要把原始创新能力作为评价的重要指标,使最有创造性的想法得到有力支持。